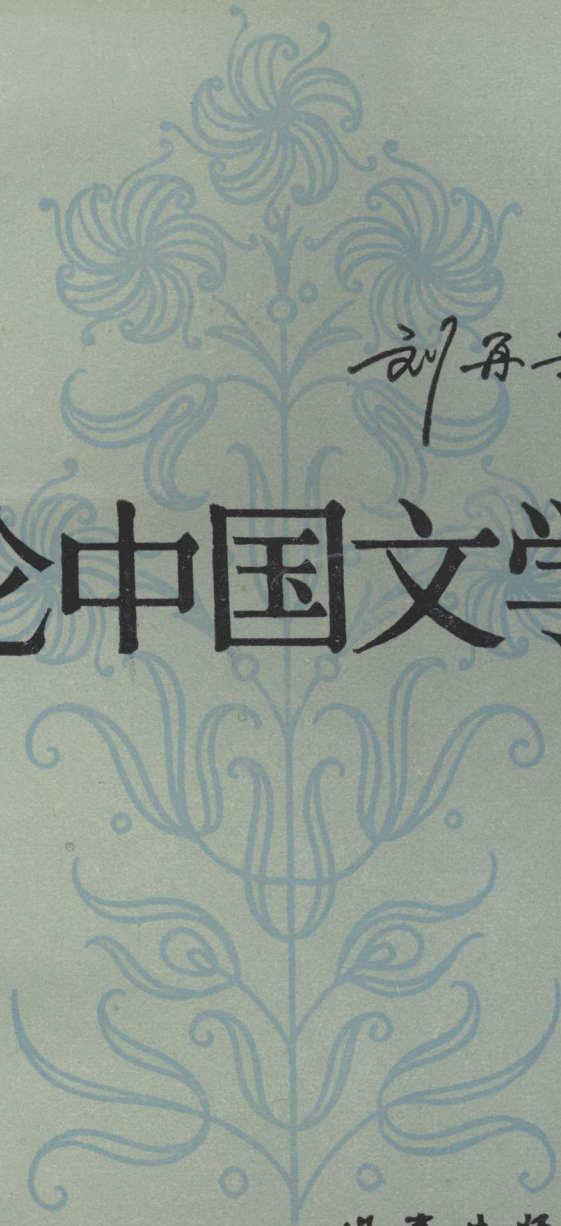




刘再复

论中国文学

作家出版社



刘再复

论中国文学

作家出版社

论中国文学

作者：刘再复

责任编辑：那 耘

装帧设计：苏彦斌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电话：**5005588转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印刷：北京纺织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339千

印张：14 **插页：**5

版次：1988年8月北京第1版第1次

1988年11月北京第2版第2次

ISBN 7-5063-0150-4/I·149 (平装)

ISBN 7-5063-0151-2/I·150 (精装)

定价：4.05元 (平装本) **定价：**6.95元 (精装本)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文学与艺术的情思（代前言）

——与李泽厚的文学对话

刘：好久不见了，朋友们都很想念你。去年春节你远走高飞的时候，曾嘱托我要告诉年轻的朋友们：“我会回来的。”我已经完成了任务。

李：我也很想念朋友们。很奇怪，妻子、孩子都和我走了，就在身边，但还是感到孤独，很想念国内的朋友。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从感情上讲，应该是对的。那里的关系总和代替不了这里的关系总和。

刘：我们的民族儿女，多数是土地的崇拜者，不管走到哪一个天涯海角，总是想着祖国，总有一种奇怪的“恋母情结”。这可能与民族文化心理有关。

李：你最近在《文汇月刊》上发表的谈话，我已经读过了。我支持你。你还是客气，对《李自成》的第一卷还有肯定。前年底，我在对《福建论坛》发表的一个谈话中，就支持你提出的一些文学观念，可惜去年在这个刊物的一月号发表的时候，他们把这一节删掉了。

刘：我在《论文学的主体性》一文中，曾提出一个观点，即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常常突破原来的设想。因为一旦进行创作，

作家笔下的人物就有独立活动的权利，这种人物将按照自己的性格逻辑和情感逻辑发展，作家常常不得不尊重他们的逻辑而改变自己的安排。而且，作家在创作之前的设想，一般都停留在意识层次活动，而进入创作之后，他们往往要调动全身心的情感，此时，处于潜意识层的东西也参与了创作过程，并会改变原来意识到的部分。如果一切都事先“精心设计”好了，就不可能进入创作的自由状态。不知道你是否赞成这个观点？

李：在新加坡期间，我在接受《联合早报》记者采访时也谈过这个问题。我回答说，要艺术家在创作之前事先决定要表现何种思想是不可能的。文学创作在很多时候是无意识的，这要经过大量的生活经验和文化素养的积累，然后喷发出来。许多古典文学作品的产生都说明了这点。因此，要作家事先想好一个主题才写，不符合创作的规律。

刘：我们所谈的这个问题，正是探讨文学创作规律的一个课题。就象探讨诗歌创作中的通感、变形、意象、佯谬语言等等，完全是应当的。这种探讨与文学要不要关心社会、关心政治不是一回事，也决不意味着蔑视文学与社会、文学与自然、文学与政治等外部关系问题的探讨，即文学的外部规律的探讨。

李：连这种问题的探讨也不允许，还有什么文学理论！所以我一直劝作家多读各种各样的书，但千万不要读“文学理论”。

刘：我能理解你的激愤之辞。如果我的文学理论扼杀作家的灵性和个性创造力，我宁愿他们坚决抛弃，不要浪费生命。

李：你最近还发表了什么文章？

刘：我最近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一篇《近十年中国的文学精神与文学道路》，对新时期文学作了第二次概述。文章一开始，就请了你这位美学“尊神”来吓唬人，我说你多次肯定了新时期文学。

李：是的，我一点也不含糊。

刘：新时期文学是充满变革精神的，而且与世界文化思潮相呼应，它寻求人类文化前进的轨迹，寻求与世界文化的同构点，这其实是很好的现象。在我的印象中，你对舒婷、北岛这一年轻诗群给予很热情的评价。

李：是的，我把这些年轻诗群比作新文学的一只春燕。舒婷的诗表现当时青年一代真实的苦闷和追求，有诗味。诗不必求多，每一个诗人能留下几首让我们乐于传颂的诗就够了。

刘：舒婷的诗，在新时期文学萌芽时期，适应了时代的审美趋向，把当时一代青年的感受诗化地表现出来。她的诗还带有伤感的美。

李：这种伤感的内涵是现代的，但形式则有点古典味。

刘：她们不承认自己的诗是朦胧诗，但她们的诗确实表现年轻诗人们一种朦胧的苦闷和朦胧的愿望。她们的诗，象征性很强，意象的内涵也较丰富。还有一些老诗人和中年诗人，他们这十年中的诗写得非常好，你可能不太注意。

今天，我倒是希望同你谈谈新时期文学的不足之处，或者说，谈谈你对新时期文学的期待。

李：我希望我们的作家气魄能更大一点。不要急于发表自己的作品，不要急功近利。真正成功的作品，真正反映一个时代的作品，现在发表或者若干年以后发表都一样。这样，就不会为了发表，而迁就一时社会的文化的气氛，违心地修改自己的作品，甚至动摇原来气魄雄大的构思。

刘：现在确实少有面壁十年进行潜心创作的作家。

李：既然献身于文学，还经不住一时名利的诱惑吗？要决心写真正有价值的东西。真正有价值的文学作品是不怕埋没的。不要急，不要迁就，不要迁就一时的政策，不要迁就各种气候。象卡夫卡的作品，甚至是死后才被人们认识到其价值的。《日瓦戈医生》，不是也在帕斯捷尔纳克死后才发表吗？但历史给了他们以公

正的评价。

刘：卡夫卡是真正献身于文学事业的。他对文学事业极其真诚。他从事文学创作的内在气魄很大。为了文学事业，他牺牲了健康，牺牲了爱情，牺牲了许多人生的欢乐。他的内心有一种不可摧毁的东西。他以坚韧的意志力量抗拒悲剧式的命运和悲剧式的环境。他认为可忧虑的社会是难以驾驭的，但每个人的自身是可驾驭的。自己可以决定自己。他正是以这种非凡的内在气魄，献身于他所选择的事业。他是别一种意义的英雄。

李：献身于文学事业，就是要对文学无比真诚，果戈理对自己的作品不满意的时候，就毅然地烧掉自己的手稿。这就是真诚。一个真诚的作家，只对人民负责，只对历史负责。

刘：真诚，对于作家是绝对重要的。

李：离开一段时间，对国内文艺界的情况又有些隔膜，你能给我讲讲最近文艺创作的发展情况吗？

刘：你走了一年多，出现了一些情况，就是“报告文学热”。报告文学作品十分畅销，最近《新观察》杂志发表了徐刚的《伐木者，醒来》，又产生了一次“轰动”。之后，《当代》杂志发表了胡平、张胜友的《世界大串连》后，又印了十万册单行本，一售而空。在这之前，钱钢写的《唐山大地震》、苏晓康所写的《洪荒启示录》、《神圣忧思录》、《阴阳大裂变》等，都吸引了大群的读者。

李：这是很好的现象。他们的报告文学有些什么特点呢？

刘：他们已经打破了刘宾雁的创作模式。刘宾雁的报告文学作品，主要还是写一个人，一个事件；而这些新秀，则写一个宏观性的重大社会问题。如人口爆炸问题、婚姻问题、教育危机问题、同居者问题、人才外流问题。

李：除了注意宏观的之外，还要注意微观，报告文学一定要真实。如果报告文学不真实，就失去自身的价值。为什么读者对

报告文学会产生这么大的兴趣呢？

刘：我想，这是因为读者关心自己的切身利益，关心自己身处的社会。这几年我们的社会情况变化得非常急速，身处社会的人反而不认识自己的社会，因此，他们想了解社会的真相、社会的全景。报告文学正好满足读者的这种心理需求。从报告文学的作家来说，这一群后起之秀，对社会格外关心。他们也有我国知识分子的通病，总有点忧患意识，总是喜欢用自己独特的忧思和期待的情思去关怀社会。

李：我很赞赏他们的这种精神。文学应当关心社会，尤其是中国的文学家。我认为世界上第一流的作家例如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卡夫卡，他们都是深刻地关怀社会的作家，都是把自己的作品与时代最根本的东西联系在一起。社会最焦虑的问题也是他们最焦虑的问题。在这方面，中国作家是有很好的传统的。躲到“象牙塔”里，历来为中国作家所不齿。

刘：我赞成你的观点。在中国，作家是应当讲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在美国，一个作家或一个知识分子如果整天嚷着责任感、使命感，可能有些可笑；但在中国，作为一个作家和知识分子，如果不讲责任感和使命感，同样也可笑。

李：不仅可笑，甚至可悲。

刘：美国是一个历史很短的国家，只有二百年的历史，而且他们的温饱问题早已解决，他们的知识分子虽然也关怀社会，但需要作家去忧虑的问题毕竟要比我们少，而我们则不然。我们有四五千年的历史，传统的包袱那么沉重，现在的社会问题那么多，不讲责任感，恐怕是不行的。

李：中国还那么苦，如果作家什么也不管，忘记自己的责任，对人间痛苦无动于衷，就缺乏作家的良知。

刘：这几年我喜欢讲良知。作家的良知，其实正是使命感。我在天津的一次讲演中，曾对文学动力问题发表过这样一种意见，

认为弗洛伊德的把“性压抑”作为文学的“动力源”，只能说明一部分问题，而大部分作家的动力源则是良知压抑，这尤其是中国文学普遍的动力源。我记得在你的美学论文中多次地讲到，文学艺术不等于审美，文学也有非审美的部分。非审美的部分，可能就是社会责任感这一些了。这种责任感，也是你猜想的审美的复杂方程式的一个要素吧。

李：可以这么说。我一直不赞成把文学变成纯艺术。我主张文学多元化，尊重各种不同内容、不同形式、不同风格的文学的并存和竞争。纯文学也应当让它们自由地发展。但我还是更喜欢象刘宾雁、刘心武这类反映社会忧患的作品。这种作品对我们来说，还是太少了。年轻的朋友都说写这种作品的作家很痛苦，但我“欣赏”这种痛苦。一个真诚的作家，对于社会的痛苦决不会无动于衷，这些痛苦应当在他们的心灵上引起不安，如果他们对人间的痛苦彻底冷漠，我想，他们的作品是难得真正感动人的。

刘：近两年来出现的报告文学作品，所以感动人，正是他们抓住了时代的痛苦点、社会的焦虑点。

李：报告文学四个字，重点应当是“报告”这两个字。报告的特点，就要求真实。能真实地报告社会所焦虑的东西，就会有价值，就会在历史上留下。

刘：将来的历史家可能会把我们现在刊物上所记载的东西当成“正史”，而把报告文学所报告的事实当成“野史”。

李：不管是“正史”还是“野史”，都应当“真实”。如果虚构，那就变成小说了，变成另一种质了。

刘：我曾担心，报告文学作家忧思太切，急于表现社会，可能精雕细刻的功夫不够，会影响文学性。你觉得这种担心有必要吗？

李：我认为不必担心。报告文学的意义首先在“报告”，首先在于它把文学与时代的某些最扣人心弦的东西联结在一起。这里，

也包含着作家的文学情思。报告文学受欢迎，说明文学关心社会就会有广阔前途。现在有些年轻的作家已宣布他们以玩文学为荣，评论家也这样鼓吹，我真觉得悲哀。有种“文学等于地球”的理论，硬说不能问文学有何目的，正如不能问地球有何目的。但大家都清楚，地球离开人可以照样转，但文学离开人，如何转动呢？

刘：对年轻的朋友，过去我是一概地加以鼓励，以后要向你学习，要加以分析。

李：我想这是重要的。几年前我也把青年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鼓励。但对于青年，还是鲁迅看得深刻，有各种不同的情况，有睡的，有醒的，有踏实的，有轻浮的。有的青年想用一篇文章就骂倒新时期文学，甚至骂倒一切，看来十分激进，其实十分保守，把当前主要问题和主要弊害掩盖起来。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都包含着超前的眼光，但是，太超前了就反而会和落后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了。

刘：刘心武最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中国作家与当代世界》，文章中批评了一些青年作家蔑视社会责任感，甚至要取消文学的“意味”。

李：我赞成刘心武的批评。中国人民正在通过改革艰难地寻找意义，作为中国的一个作家，却忙着要抛弃“意味”，这未免太自私了吧？文学没有“意味”，那只好作者自我玩赏了。社会应当允许沙龙文学的存在，宽容度应当大一些，但沙龙不应当是我国所有作家追求的东西，尤其是大作家。我喜欢社会艺术，不喜欢沙龙艺术。我担心沙龙出不了我们的社会所期待的大作家。

刘：有些年轻的朋友对讲责任感、使命感产生过反感。这是值得我们反省的。以前讲这一点的时候常常带强制性，而且太功利化了。我想，使命感、责任感也应当是一种感情，一种对祖国和人民真诚的爱。它不是表层的东西，而是心灵的东西，它是自

然的、自愿的。只有当使命感、责任感成为发自内心的要求才有意思。古人讲“孝”的责任，本来也是应该的。但“孝”的责任一旦功利化，制度化，就成了谋取“孝廉”官职的手段，“孝”就变成虚伪的道德了。“举孝廉，父别居”的悲喜剧就是明证。

李：对道德的强制而导致非道德化的教训，确实值得记取。

刘：现在我还想与你交谈另一个问题。我认为，文学与艺术的审美要求有所不同。艺术门类，如音乐、绘画、雕塑，可能更有利于表达美。表现人性恶，可能不是艺术的长处。而文学则可能把人的丑恶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李：艺术部门中的某些门类，如美术也可以有力地表现丑恶，例如现代主义的绘画，就有力地表现丑恶。但我对文学特别是今天中国文学的要求与对艺术的要求有区别。就我个人来说，对于文学，我就喜欢现实主义的作品，但是艺术，我却更喜欢现代主义。文学具体些好，艺术可以更抽象。这里涉及一些美学问题。

刘：同样是现实主义的作品，也可以写得很不同。十多年前的许多现实主义的作品，它们所反映的现实，不是作家自身选择的现实，不是充分个性化、感觉化的现实，而是本本中的现实、别人头脑中的现实，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结构下所派生的现实，所以当时的所谓现实主义作品，概念化、公式化的东西很多，使得人们不喜欢读。例如，写农村中的现实，就只能写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现实。新时期文学的现实主义作品就不同了。他们的主题、题材、写作方式都是经过作家主体的选择的，他们笔下的现实是自己理解的现实，是充分个性化的现实。因此，许多现实主义作品，也是人们所喜爱的。现代主义色彩的作品，其实也有现实感。

李：电影是文学与艺术之间的综合艺术。最近我看了《红高粱》，觉得非常好，是对中国民族的生命力的歌颂。

刘：从《黄土地》到《红高粱》，这可以看到我国的西部电影。

导演吴天明和张艺谋很有才能。这种“西部电影”的风格很粗犷、苍凉。

李：我对《黄土地》评价很高，不仅在艺术形式上，而且也在内容上。《红高粱》也是这样。

刘：《红高粱》表现我们黄土地上一群贫穷而富有生命力的人，表现他们的人性的热烈、粗糙与顽强——敢生，敢死，敢爱，敢恨，虽然贫穷，但洋溢着生命。《红高粱》在艺术上运用了表现主义的手法，整部影片充满了激情，画面的色彩非常强烈，场面十分壮观。某些画面（如剥皮）甚至是酷烈的。而且还运用了抽象概括，如酒厂的掌柜和工人，不分阶级。《红高粱》原著的作者莫言和电影导演张艺谋都很年轻，他们的作品不拘一格，很有艺术想象力。

李：《红高粱》、《黑炮事件》等电影中有些变形的怪诞手法，就并不是在玩形式，而是有深刻的含义和内容，给人印象强烈。

刘：《红高粱》这部影片主观色调很强，而且常给人一种奇趣。他们表现现实，但首先把现实世界“打碎”，然后通过创造主体进行重新建构，最后展示在观众面前的是一个独特的世界。

李：《黄土地》的色调与情感似乎没有那么集中。

刘：《黄土地》比较客观化、生活化一些。风格上虽也苍凉，但比较淡泊，简朴，有点返朴归真的味道。

李：《黄土地》刚出现的时候，那么多人非议，真是莫名其妙。

刘：两年前，《黄土地》刚问世，连一些电影界的老权威也责难。那时，你就对我说，应当支持《黄土地》的艺术探索；并肯定它的探索是成功的。你的看法是对的。《黄土地》、《红高粱》，包括《老井》，在电影艺术上确实是有所突破。《红高粱》也许是得益于张艺谋的年轻，没有框框。小说家莫言和导演张艺谋都很少框框。文学艺术创造，的确常常需要大灵感，需要灵感的激流，灵感的爆发。老一代的作家和艺术家，已获得令人钦佩的成就，

但他们的审美信息饱和之后，就容易堵塞灵感的喷射口，很难产生大灵感。当然也有许多例外，如巴金，十年前就有一次大的彻悟，他抛掉了堵塞思想（也包括灵感）的框框，写出了了不起的《随想录》，把我国的现代散文大大地推向前进。

李：我记得你说，我们正处在两代人的中间，一方面觉得我们走得太远，一方面则觉得我们太保守。我不管两个方向上的责难，走自己的路。对那种水平不高而又骂倒一切的年轻人要说些话，但对张艺谋这种有真才能的新秀，则要支持。

刘：但愿年轻的朋友会知道我们是爱他们的。

目 录

文学与艺术的情思（代前言）

——与李泽厚的文学对话 1

· 第 一 辑 ·

中国文学的宏观描述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首条 3

对中国文学概貌的集体思考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首条写作札记 28

附 录：撰写“中国文学”条目座谈会记录
性格对照的三种方式及其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命运 45

· 第 二 辑 ·

“五四”文化运动与中国人的觉悟 85

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对人的三次发现 107

鲁迅和中外文化 116

鲁迅在“五四”时期倡导“科学”和“民主”的斗争 130

《孔乙己》的美学力量 147

中国新诗草创期的文学精神

——谈胡适与郭沫若 156

巴金《随想录》的标志性意义 172

作家的良知责任和文学中的忏悔意识

——评巴金的《随想录》	174
老舍概评	
——在全国第三次老舍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的发言	187
俞平伯概评	
——在纪念俞平伯先生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会上的讲话	191
聂绀弩概评	
——为聂绀弩先生所作的悼词	197
张天翼概评	
——在纪念张天翼逝世一周年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203
赵树理概评	207
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一面痛苦的镜子	
——论赵树理创作流派的升沉	215
何其芳概评	
——在纪念何其芳同志逝世十周年学术报告会上的讲话	236
我们热爱何其芳同志	
——《衷心感谢他》序	250

· 第 三 辑 ·

论新时期文学的主潮	261
近十年中国的文学精神和文学道路	
——为在法国出版的《中国当代作家作品选》所作的序言	278
笔谈外国文学对我国新时期文学的影响	301
未来十年文学的猜想	309
八十年代散文诗一瞥	
——《十年散文诗选》序	314

· 第 四 辑 ·

挚爱的冷峻的精神审判	
——评王蒙的《活动变人形》	327
诗人思维结构的新组合	
——读邵燕祥的抒情长诗	332
他把爱推向每一片绿叶	
——《刘心武小说选》序	340
他献给世界以温暖的情思	
——《刘湛秋散文诗选》序	351
从炼狱中升华了的灵魂	
——彭柏山同志和他的《战争与人民》	356
笔分五彩写风云	
——评蒋和森的长篇历史小说《风萧萧》	363
深切动人的奋斗者之歌	
——影片《人到中年》观后	368
美，蕴藏在普通人的心里	
——评影片《如意》	372

· 第 五 辑 ·

王朝闻美学理论的系统剖析	387
蔡仪概评	
——纪念蔡仪先生从事美学研究六十周年	401
文学批评需要赤诚	
——《新时期文学思潮》序	406
附录：刘再复谈文学研究与文学论争	409

